



2013年02月19日 星期二
编辑:贾晶晶 E-mail:kqgs·jia@gmail.com 校对:筱华 美编:王祯磊

07

白领回乡创业梦

家乡路宽了,车多了,经济发展了,回乡创业机会也可能成熟了

■ 本报记者 郭奎涛

“商水居然开始堵车了。不是大三轮跟拖拉机,是私家车!”

农历腊月二十七,在河南省商水县一家酒店的“聚仙阁”里,大约有20名客人的结婚宴席刚刚开始。人还没坐下就一口气喝完三杯酒的王连杰说,上海、北京这些大城市天天堵车也就算了,在商水县这么个省级贫困县的小县城,他开车从行政路到健康路,不到500米的路程,竟然足足走了半个小时,家乡的车是越来越多了。

王连杰是上海一家制药公司的销售总监,是新郎的高中同学。

回首一瞬间,从2005年到上海闯荡至今,王连杰已经在上海拼打将近8个年头了。虽然已经当上了销售总监,也结识了不少的同事和朋友,但是他一直觉得在上海没有归宿感,自己的住处也一直不敢称为“家”。而家乡的变化越来越大,渐渐地,王连杰产生了回乡发展的念头。

8年打拼无法留上海 房价和户口是障碍

看到家乡的变化,在座的客人禁不住跟自己在外地的工作生活作起了对比,当年如何背井离乡前往外地发展更是耐人寻味。

“都说自古长安一条路,就是读书。我成绩不好,回回在班里倒数,知道高考没希望,也不想浪费时间,高二没上两个月就去了上海打工。”王连杰告诉记者,因为他哥在上海工作,并介绍他在现在的这家制药公司做销售。

根据王连杰的回忆,刚去上海那两年,经验不足,人脉又少,业绩不是太好,而工资是跟销量挂钩的,比如说每月要卖到一万才有提成,他通常只能卖到8000,提成拿不到,只能靠不到两千块钱的基本工资过活,每顿只能靠馒头充饥的日子有过,没钱交房租险被房东扫地出门的时候也有过。直到近几年,在各大

难以承受春运之苦

换工作:只为离家更近一点



■ 本报记者 彭涵

“买的是正月初八的票,初九再去上班。”柳进在电话里说道,这时他正拎着刚刚置办的年货从商场里出来,两天后柳进将坐G527次高铁从北京回到河南老家。而确定同一天离乡的李居洋,现在已经和家人吃上晚饭了,他是2月3日到家的。“返程票不着急,反正到武汉的大巴车有很多,随到随有。”



河南商水正在改造中的城中村 本报记者 郭奎涛 / 摄

医院走动的多了,医生里的人缘好了,才卖出去的多了一些,一般都能超过指标完成任务。

“做了几年销售才开始慢慢往上提,去年才做了销售总监。主要就是日常监察,看看下边的销售人员有没有偷懒的,因为他们偷懒完不成指标要连累我的奖金的。完了就是每周开个总结会议,看看销售上有什么要改进的。工作还算轻松,就是反而不太习惯了。”王连杰笑道。

原来,要想在上海安家,房子则是第一道门槛。上海与北京、广州作为一线城市,一套房子动不动就是上百万元,作为每月一万元工资的王连杰来讲,8年来的积蓄竟然不足以付起一个首付。即使付上首付,30年的房奴生活也不是他所追求的生活。

还有户口问题,没有上海本地户口,医疗保险还在其次,未来子女的上学问题也让他非常担忧。

一瓶饮料引发回乡冲动

旧也叙了,酒也喝了,临走之

前,王连杰忽然拍了一下额头说:“哎呀,差点忘了,车里还有一样好东西给大家尝尝。”大家一时不知道他卖的是什么葫芦,等了一会儿,才见王连杰拎着一箱看似银露的饮料上来了。

“大家尝尝,说说怎么样,好不好喝。这是一个朋友的厂里生产的,就在商水,啥都准备好了,就差上市了。”王连杰还说,这位朋友刚好缺个销售总监,如果大家觉得这个饮料喝起来可以,他就从上海杀回商水发展。

说起回乡发展的话题,大家马上炸开了锅。一个脸盘方方的男子说,厂里还缺不缺财务,可以委屈一下过去低就了;另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的女士也说,估计广告宣传也要准备吧,她在考虑回家做个广告公司,顺便拉个订单吧。

另外一位在上海某餐饮集团工作的女士也说:“我回来发展,家乡的人真的是越来越有钱了,出现了各种新型的连锁餐馆、超市,其实这些都是从大城市里面拷贝过来

洋,因为他最终抵达了在柳进看来遥不可及的家乡——河南省信阳市,但李居洋同样认为那次旅程“很要命”。“绿皮车里人挤人,什么味都有。”李居洋说。

李居洋买的是从重庆到武汉的站票,而且16个小时之后他还要再转大巴才能到家。“到半夜了大家都蹲下来睡觉,我也想蹲,却发现已经没地方了。”最终,筋疲力尽的李居洋站着睡着了。

“当时一起的同学现在还拿这事笑话我。”李居洋有点不好意思地说,这是他在大学四年里第一次赶上春运,因为有事耽搁——但这也是最后一次了。“以后我肯定要在离家近的地方工作。”李居洋说,那时他就这一个想法。

而柳进只想找一个过年可以回家的工作,于是2011年他来到北京一家安全技术咨询公司。龙年春节来得很快,这一次是订火车票的难度让柳进“心惊肉跳”了。

“铁道部的订票网站反应太慢,好像最后还‘瘫痪’了一阵。”网络购票无果,柳进选择了电话订票。“打了很长时间才通,一问票还订完了。”当天晚上柳进没睡着,第二天早上六点半,他又登录了订票网站,一直等到7点放票,最终“奇迹般”地把回家的票订上了。“我请了一天假补觉,那天睡得特别香。”柳进说。

2011年毕业后,李居洋“如愿以偿”地在信阳市下辖的一个县城里找到了工作——在移动营业厅里推

的。我们在大城市生活了这么多年,对这些餐馆、越市的经营模式也算了解一些,只要有足够的资金,直接拿到商水开个店就是了。我感觉,回来创业,机会还是很多的。”

这下王连杰乐了,原来大家也有回来发展的想法呀。“不过,冷静下来,回来创业问题也不少。商水这样的小地方,资源本来就不多,市场也不多,早就被官二代、富二代抢得差不多啦,我们这些‘外乡人’怎么压得过地头蛇,还是大城市环境公平、开放一些呀。”

虽然也有反对的声音,不过多数人还是赞同这一说法,况且在外面已经有了稳定的工作和初步的积累,想要放弃真得不是那么容易。最终,回家创业的话题还是不了了之了。

“左右为难呀,还是再慎重考虑考虑吧。过年了,新年新开始,是得好好准备准备怎么开始了。”临别之际,王连杰一脸凝重地说道。

销手机业务,而李居洋大学时的专业是软件工程。

五个月 after 李居洋还是走人了,因为2012年3月他被告知被武汉大学软件工程学院录取。“我想还是再多学两年,以后进更好的公司吧。”李居洋说,之所以报考武汉的学校,是因为这座城市离信阳只有320公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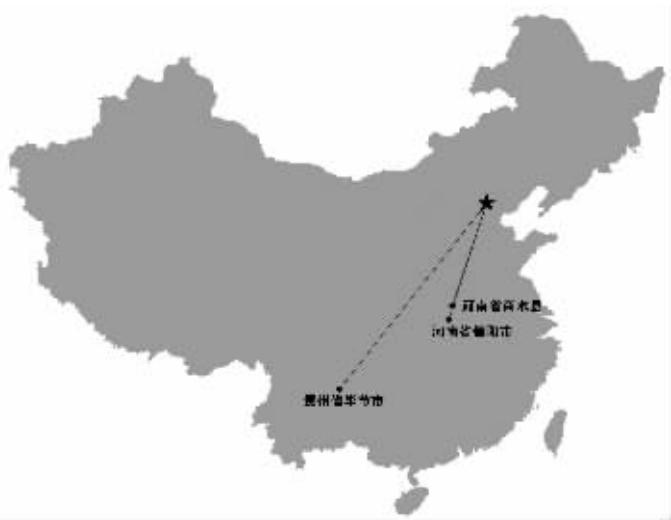
而在997公里之外的北京,柳进已经从普通员工升职为项目经理,出差的范围开始覆盖全国各地。“平时的票很好买,但到春运就不好说了。”柳进提到了他这次订票前的担心。

2012年12月26日,京广高铁全线开通,据了解,北京至广州间最快高铁列车运行时间可在8小时以内,较目前既有京广铁路普速客车运行时间压缩12小时30分左右——柳进所订的G527次正是其中一趟高铁。

来回的车票最终都订到了,虽然花掉了将近900元,这比柳进去年回家的花销增加了一倍。

“我是坐大巴车回家的,四五个小时就能到。”李居洋说,“武汉离家那么近,车有很多,还挥手即停。”但他也承认学校放假较早,可能没赶上春运的高峰期。

经此一“役”,柳进对春运的恐惧也有所消退,看起来以后回不回家的主动权应该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了。“年后回来,就是想多努力工作挣钱,把日子过踏实了。”柳进说道。



没学历,没技术,没门路

山乡农民工的辛酸打工路

■ 本报记者 闵云霄

龙跃发夫妇今年没有回家过年,因为他觉得无法面对自己的父母。

1月17日两岁的孩子在了“上好佳”粟米条后,昏迷不醒,随后送到医院抢救,最终也没能保住性命。

龙跃发是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阴底乡星秀田村农民。今年已过而立之年,他生长的阴底乡,位于乌蒙山区,属贵州省二类贫困乡,根据2006年的官方统计数据,全乡农民人均纯收入1320元。山头里种出来的粮食,要收成好的时候才够一年吃,而其他生活开支,只有靠喂鸡生蛋出售。所以,他和很多贵州农民一样,多年前加入到外出打工的队伍中。

经过多年的辗转,龙跃发在宁波市北仑大碇镇的一个小厂驻扎下来,为了节约钱养家糊口,过年的时候也经常不回老家和亲人团聚。尽管这样,他并不觉得苦,但让他无法接受的是,抛家舍业出门打工,孩子却客死他乡。

孩子死在打工地

1月17日是龙跃发最痛不欲生的一天。那天,他和往常一样在厂里干活,妻子带两个孩子在家,中午,6岁的大女儿从附近买了一包“上好佳”粟米条给两岁的第二个小孩吃,等龙的妻子上厕所回来的时候,眼前的场景让人不知所措,孩子倒在地上,脸色发白嘴唇发黑,他叫了几声,发现儿子不清醒,120送到医院后,抢救50分钟无效死亡。

这包花五毛钱买来的粟米条还没有吃完一半。龙跃发认为,粟米条可能有毒。按照医院的解释,小孩属于窒息死亡,龙跃发表示,就算是窒息,到底是什么原因窒息,也云里雾里,他认为“上好佳”粟米条有粘稠性,也许卡住了喉咙,厂家应该在包装袋上提示婴儿不能食用。他找到大碇派出所,民警告诉他,如果尸检,需要3万元的尸检费。3万元,这对于一个农民工来说,一年的存款都不够。

他只好去找出售粟米条的新华联超市,该超市老板不管不问,龙跃发找过宁波市多个政府部门,也没有任何结果。在龙跃发看来,生产厂家对此负有责任,但他多次拨打“上好佳”(中国)有限公司的电话,未果。记者多次联系该公司,也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。

龙跃发想不明白的是,这家超市的外面挂的是新华联超市的牌子,而工商营业执照上写的其实是“北仑区大碇镇朱宇峰食品店”,事情发生后,新华联超市的多种“上好佳”粟米条已经被宁波市北仑工商局查封。大碇镇朱宇峰食品店负责人告诉《中国企业报》记者,超市之前挂的是另外一个名字,现在新华联超市的名字也是随便挂的。

2月9日,是除夕之夜。当别人高高兴兴地吃年夜饭的时候,龙跃发却双手捂住脸欲哭无泪。

候鸟一样飞来飞去

在星秀田村周边附近的多个村庄,早在改革开放之初,龙跃发父辈一代主要靠种庄稼为主,一年四季的辛苦耕种之余,也外出打工挣点零花钱。老的一辈没有技术,大多文盲,在外地也没熟人,一部分农民对“打工”曾经抱对立场:“金窝银窝,不如自家猪窝狗窝”、“在家千日好,出门万事难”。

贵州人均耕地仅0.76亩,人多地少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软肋,因此,劳务输出势在必行。2004年以来的几年间,农民工外出创收占了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的40%以上。同时据纳雍县邮政局储汇业务部统计,每年经邮局的进口汇款(大部分为打工汇款)约30万件左右,金额逼近2亿元,“这还只是所有打工汇款中的一小部分,大部分都通过银行渠道寄回了。”

王兴明来自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县,到浙江打工已两年多,一直没回过家。虽然今年票价不涨,但由于贵州往华东方向的民工特别多,他便提前十天订票。王兴明告诉记者:在火车上,自己根本没有闭过眼,担心一旦睡着,自己所带的东西和身上的钱被人偷走。

而黔西林泉龙士德虽然年近七旬,为了生计,在外打工也有十多年,说到打工的艰辛,辛勤的泪水簌簌而下。开始,龙士德在广东一家玩具厂当保安,月薪1000元,每天值班从晚上一直到凌晨6点,白天还要帮着管理厂里进进出出的车辆和外来人员。休息四五个小时,对于上了年纪的他来说,简直无法支撑。他告诉记者,他打算本来不回家过年的,趁春节期间有加班费多挣点钱,可是因为自己前不久生了一场病,很害怕客死他乡。谈话间,有人从身边走过,龙士德与王兴明一样,表现得异常警惕,紧紧用布满老茧的双手按着自己的行李。

目前,贵州劳务输出规模已经形成了800万人的浩荡之势,从黔西北乌蒙山麓到黔东南苗乡山寨,从赤水河畔到瑶山大地,一拨拨农民工正在不断地走出山门,活跃于全国各地,全省劳务收入达1000亿元。